



前言

读者面前的这部《解读天方文学》，是我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以来陆续写出的。其中不少是名符其实的论文，有些则是篇幅不算太长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的内容，也是阿拉伯文学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具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和认识价值。除个别外，这些文章都是曾经发表过的。这次能够结集出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自己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但更令我高兴的，是对广大读者，尤其是对喜欢阿拉伯文学、对阿拉伯文学研究有兴趣的人的一种奉献，为他们提供一点借鉴。

阿拉伯文学，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极为丰富，有的取得了很高成就，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随着一个个阿拉伯国家的建立，阿拉伯现当代文学更是绚丽多彩，各具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国文学翻译的蓬勃发展，对阿拉伯文学的翻译也日渐增多，一段时间甚至非常兴旺，不少重要的阿拉伯现当代文学作品都陆续翻译过来。随着有关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充实，随着阿拉伯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加上全国各高等院校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的增多，对广大师生来说，对阿拉伯文学的了解和研究，就成了一门必不可少的课程，而对阿拉伯文学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更加促进了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还有很多懂得阿拉伯语、喜欢阿拉伯文学，孜孜不倦从事阿拉伯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广大爱好者……这些就是我国阿拉伯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基本队伍和力量。

应该说，这些年来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类研究文章数量颇多，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出现了一些（虽然为数不多）具有一定深度和力度的研究专著。加上翻译作品，所有这些成就，为加强中国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中阿友好交流和发展搭起桥梁，作出了贡献。

我的这部阿拉伯文学论文集只是我国众多阿拉伯文学研究文章中的一小

部分——虽然从个人角度讲可能是数量最多的。

这部论文集包含有：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古代文学等内容。附篇中是几篇编译文章。鉴于其所涉及的对象和对阿拉伯文学总体了解的重要性，也将其收入书中。

写作一篇好的研究文章，确实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就是那些篇幅不长，具有动态性的文章，要把它写好，写得有质量，也是要建立在对阿拉伯文学、对研究对象总体的把握、长期的积累和深刻的了解基础上。而那些研究性的论文，则更要占有大量资料，有的需要酝酿、思考很长时间，甚至几年、十几年工夫。

一篇好的研究文章，需要具有多种要素。但最重要的，是要说出自己切合研究对象的独有的观点和见解，哪怕这种观点和见解只是初步的、探索性的。切忌落入人云亦云的俗套。

在《纪伯伦作品中的“狂”及其内涵的延伸和演变》中，笔者对这位蜚声世界、在中国极具影响力的作家，通过“爱与恨”“上帝的位置”“孤独感和挫折”“小我和大我”几个方面，梳理和剖析他思想发展的脉络和过程，如何由一个因恨——恨一切旧事物——而崇尚暴力的尼采的信徒，成为一个舍弃小我，对人们充满希望，最终达于对人类“泛爱”的大我之至境，写出像《先知》这样的作品。

在《马哈福兹小说的象征性》中，对人们很少涉及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家的几部象征主义作品，尤其是颇具争论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分析，揭示出作家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一生永不停歇地“寻本求真”“摈斥丑恶”的崇高思想境界。在后一部作品中，通过寓意的形式，表现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关注、解析和探索，其希望建立一个美好、公正、平等、科学社会的理想，跃然纸上。正因为是寓意和象征，这部作品才是超国界的，具有着永恒的意义。最近，这部在埃及被禁达五十余年之久的作品，终于在作者去世后不久经宗教权威机构认可在埃及公开出版。

在《我从极度沉默中写作》中，揭示了阿尔及利亚作家，尤其是用法语写作的作家当前所面临的诸多矛盾：不同文明的矛盾、社会不同阶层和人群的矛盾、世俗和宗教的矛盾，甚至面临写作和死亡的矛盾……种种困境，也许能使作家沉默一时，但在“极度沉默之后”，他仍然会勇敢地拿起笔。这不只是阿尔及利亚作家的写照，也是当前几乎所有正直的有良心的阿拉伯作家面

临的情状。

在《马杰侬和莱拉，其人何在？》中，对这对阿拉伯和世界著名恋人故事的发展和成为“典型”的来龙去脉进行解析，力图在原型、类型、典型的演变上作出一点理论的探索和论述。

还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有些文章涉及到比较文学，如《一千零一夜和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生活和市民心态》《一千零一夜中的印度母题和结构》《佛经与阿拉伯文学》《终身不笑者的故事》和“妙音”》等，都是作者在这方面的一点探索。在研究文学，特别是研究东方文学时，不仅需要，而且应该涉及到比较文学，特别应该涉及到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古代东方各国，尤其中国、阿拉伯、波斯、印度……在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方面非常发达和繁荣。各国史籍和文学中留下了大量的记载。在文学中彼此相同的故事或类似的情节比比皆是。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很难探寻出彼此交流和影响的来龙去脉（中印文学间的交流和影响由于佛教的传播较为清晰一些）。如果在研究中，能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相关故事加以比较，特别是过去比较薄弱的中国、阿拉伯、波斯间的比较，相信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成绩。一位学者曾指出：“亚洲各个文化体系的相互影响却是当前世界比较研究的薄弱环节。我们正面临一个综合、联系、交流的时代。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比较文学正是我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①

笔者在自己的一部研究专著中，曾引用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的一句话：“著得一部新书，便是千秋大业。发前人未发之论，方是奇书。”无论是笔者研究《一千零一夜》的专著，还是这部论文集，都谈不上是奇书，更不是什么千秋大业。不过令笔者感到欣慰的是，在研究方面，力求比前人更进一步，在有的方面则发前人未发之论。

笔者对文章的取用还是有所选择的。不仅一些应景的文章不予选用，就是一些已发表的自己认为较好的论文，如《阿拉伯“情痴”的世界性影响——“马杰侬和莱拉故事”与文人文学》，主要从故事与文人文学关系展开论述，但其资料与《马杰侬和莱拉，其人何在？》有些地方相同，故舍弃不用。

由于写作年代跨度较大，笔者对自己的文章不敢敝帚自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所难免，如有的文章在论述时不够生动、活泼，有的文章理论色

^① 乐黛云：《比较文学的名与实》，载《读书》1985年第10期。

彩不足等。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有关专家、学者，读后不吝赐教。

我还想指出的是，尽管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但与阿拉伯文学的丰富性相比，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过去集中在对埃及、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等文学研究比较多，对海湾文学、沙特阿拉伯半岛文学、马格里布文学研究较少。对古代文学中的许多重要作品，如悬诗、情诗、苦修诗、哲理诗、咏物诗、苏菲诗、宗教诗、彩诗，还有民间文学以及许多重要诗人、作家，如穆太纳比、麦阿里、伊本·穆格法、贾希兹等的研究都还很不够。偏重小说研究，忽视诗歌、戏剧研究等。确实，阿拉伯文学不止是一部《一千零一夜》，就是对涉及较多的《一千零一夜》的研究，也还有很大的深入余地。

过去我国开设阿拉伯语课程的高校只有五六所，至去年已增至二十一所。还有大量民间学习阿拉伯语的人员。中阿交往、中东形势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阿拉伯语人才。阿拉伯文学是他们掌握阿拉伯语、了解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诚然，“天方之国”还有许多领域值得研究，如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教、语言……目前，阿拉伯文学研究的队伍还不够大，研究生、博士生如果不从事相关工作，研究也难以为继。但阿拉伯文学研究这个阵地必须坚持下来。在希望阿拉伯文学研究更加深入，期望更多年轻学子投入这项工作之际，我向他们献上这部《解读天方文学》——中国第一部阿拉伯文学论文集。

1987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成立。通过召开各种研讨会，无疑促进了阿拉伯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在纪念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成立20周年之际，我深切怀念阿拉伯文学研究会首任会长，我在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时的老师、穆斯林学者刘麟瑞教授。

我要深深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感谢哈若蕙副社长，她对我的论文集表示肯定和支持。特别要感谢戎爱军和李莉编辑。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她们付出了很多精力——从策划、审稿，到编辑、校对，事事做得周密、细致。今天这部论文集问世，与她们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再次对她们深表谢忱！

鄧溥浩

2007年10月15日

目 录

Contents

现当代文学

- 论黎巴嫩旅美作家努埃曼的短篇小说 / 003
- 纪伯伦作品中的“狂”及其内涵的延伸和演变
——兼与鲁迅《狂人日记》比较 / 012
- 纪伯伦和他的《先知》 / 022
- 一部近 70 年来争论不已的作品
——记塔哈·侯赛因的《论蒙昧时期诗歌》 / 025
- 塔哈·侯赛因和他的《日子》 / 029
- 马哈福兹小说的象征性 / 032
- 马哈福兹——阿拉伯文学的一座金字塔 / 042
- 获奖之后的挑战
——围绕《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争论 / 047
- 在艰难中崛起、创新
——记埃及 60 年代作家群及他们的近期创作 / 054
- 不可避免的艰难历程
——谈几部反映东西方文明冲突的阿拉伯小说 / 058
- 斯人长逝 诗名永存
——记叙利亚诗人尼扎尔·格巴尼 / 062
- 埃及现代文学的巨擘
——论陶·哈基姆的小说、戏剧创作 / 067
- 台木尔和他的小说创作 / 074

目录

Contents

女性文学

情感的失落 性的困惑

——埃及当代女性文学一瞥 / 081

阿拉伯当代女性文学扫描 / 084

科威特王室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的诗歌创作 / 087

“我从极度沉默中写作”

——记阿尔及利亚女作家阿西娅·杰巴尔 / 090

比较文学

佛经与阿拉伯文学 / 095

“终身不笑者的故事”和“妙音”

——两则中阿文学故事比较 / 102

中阿古代交往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 / 110

民间文学

论《一千零一夜》对商人生活的描写 / 117

《一千零一夜》和“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生活和市民心态 / 133

《一千零一夜》中的印度母题和结构 / 143

《一千零一夜》和性 / 151

《一千零一夜》和中国文学 / 171

《一千零一夜》故事类型论析 / 178

《一千零一夜》与中国章回小说之比较 / 199

阿拉伯马格里布民间故事集——《一百零一夜》 / 206

目 录

Contents

古代文学

- 具有永久魅力的阿拉伯诗歌——悬诗 / 213
- 阿拉伯散文文学的瑰宝
- 伊本·穆格法和他的《卡里莱和笛木乃》 / 236
- 马杰依和莱拉 其人何在？
- 关于原型、类型、典型的例证 / 252
- 中世纪阿拉伯文学的一颗闪亮明星
- 记艾布·阿拉·麦阿里 / 260
- 登霄传说和世界文学 / 274

附 篇

- 译事悠悠续千载 / 283
- 获奖之后的对话
- 埃及《图画》周刊对纳吉布·马哈福兹的采访录 / 290
- 苏丹作家萨利哈谈他的创作 / 295
- 突尼斯诗人沃哈依比谈阿拉伯诗歌 / 299
- “我是被投入火中熔炼的一块铁”
- 哈纳·米奈访谈录 / 304
- 我写作 我就应被杀
- 阿尔及利亚作家面对死亡恐怖 / 307
- 人为炒作还是现实潮流？
- 埃及女性作家谈“女性文学” / 312

现当代文学

论黎巴嫩旅美作家努埃曼的短篇小说

1958年12月，在黎巴嫩历史上，第一次以政府名义为一位作家举行为期一周的盛大庆祝活动，表彰他在半个世纪里对阿拉伯文学的杰出贡献。这位作家就是米哈依尔·努埃曼（~~米哈依尔·努埃曼~~ ~~米哈依尔·努埃曼~~）。

本世纪初，随着阿拉伯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反抗外国殖民统治斗争的高涨，在阿拉伯文学上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流派——埃及现实主义文学和旅美侨民文学。两派作家冲破僵滞、保守的传统，从现实生活摄取题材，以清新的艺术风格创作了大量反映人民生活疾苦和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品。在埃及，产生了塔哈·侯赛因的《日子》《大地上的受难者》，陶菲格·哈基姆的《灵魂归来》《乡村检察官手记》以及马哈姆德·台木尔的短篇小说等。在海外，产生了艾敏·雷哈尼的充满激情的诗篇和小说，纪伯伦的富有哲理的小说《叛逆的灵魂》、散文《先知》。这些作品像沉沉暗夜中划破长空的闪电，震撼着社会，给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为现代阿拉伯文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米哈依尔·努埃曼是旅美侨民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返回黎巴嫩后，继续从事创作。他不仅是作家，而且是诗人、剧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他蕴含着人道主义思想、闪耀着真善美光辉的著作，是现代阿拉伯文学中里程碑式的篇章。短篇小说是他著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有“阿拉伯的莫泊桑”之称。

—

1928年，努埃曼出生在黎巴嫩巴斯坎塔镇。巴斯坎塔坐落在海拔1000米的苏嫩山麓，距贝鲁特15公里。这里巨石嵯峨，溪水清澈，草木繁茂，景色秀丽。虽然他十三岁便离家求学，辗转异国，但家乡的风光一直使他恋恋难忘。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普通庄户人，父亲曾随移民到过美国，后来两手空空返回故里。小时候，他常常和祖父下地干活，有时听到祖父伤感地哼着小曲：“我们播种的庄稼，为何别人来收获？心里

多难受啊，快把麦袋还给我们！”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他无论走到哪里，仿佛都听到这歌声，听到自己祖父和同胞的呻吟。这种对故土和人民的热爱经常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也是日后他返回家乡定居的原因。

巴斯坎塔是一个拥有两千居民的市镇，居民信奉基督教马龙教派和东正教。那时，俄国东正教会在近东拥有广泛权势，努埃曼小学毕业后便进了拿撒勒俄国东正教会办的师范学校，四年后（**1856**年）又被送到乌克兰波尔塔瓦一所神学校学习。在俄国的五年学习生活对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他自幼喜欢读书，这时更深为优美而丰富的俄国文学所吸引。他在他的著名回忆录《七十自述》中，满怀深情地叙述了他在阅读这些作品时的激动心情。他读了莱蒙托夫的诗歌，深为诗人对高加索自然景色的描写而醉心，并产生了描写黎巴嫩的创作冲动。他虽然还不能完全读懂俄文，却坚持着读完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他还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他最崇拜的是托尔斯泰，其对精神修养的注重对他影响极大，他还非常喜欢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作家。假期他常到俄国同学家中做客，也有机会接触俄国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他对当时俄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沙皇的暴虐统治非常不满。

在俄国，他联想到处于奥斯曼土耳其暴政蹂躏下的祖国，和处于困袭、保守、落后状态中的阿拉伯文学。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变革阿拉伯文学的决心，那时就在作家心中萌发了。这在他当时写的诗歌《结冰的河流》中有所反映。

1856年，努埃曼回到黎巴嫩。这时他在美国的哥哥回乡度假，劝说他到美国去，于是这年**10**月他踏上了去新大陆的航程。

努埃曼到美国后，入华盛顿大学学法律和文学，**1857**年毕业。他曾在一家商业公司做打字员，不久应征入伍，随美国军队开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前线，一年后退伍回纽约。他亲眼看见帝国主义之间的野蛮屠杀给人民造成的灾祸，更增强了他反战、人道与和平的信念。

1858年第一张阿拉伯侨民报纸《费哈》在巴西问世，**19**世纪初，阿拉伯文报刊在南、北美又陆续出现，这为海外侨民文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努埃曼在华盛顿大学读书期间，常常在他中学同学、叙利亚人纳西布·阿里达在纽约主办的《艺术》杂志上发表文艺评论和作品。他写了戏剧《父与子》，通过一个家庭成员的婚姻，揭示两代人之间保守与进步的矛盾。短篇小说《又一年》《不育者》也是这时发表的。当时在《艺术》上发表作品的还有纪伯伦等海外侨民作家和诗人。对文学的共同旨趣和见解，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这时在阿拉伯本土，特别在埃及，文学复兴和变革的号角已经吹响。从**19**世纪起，阿拉伯国家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的黑暗统治下，阿拉伯文学在经历了中世纪的辉煌发展后，陷入了数百年的衰微。歌功颂德、逢场应景、僵滞保守的旧文学，无论在

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已不能适应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要求和追求新生活的愿望，不能反映各种社会现实问题。革新与传统、进步与保守、新文学与旧文学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1944年9月14日，在纪伯伦和努埃曼的倡导下，侨居美国的十名诗人、作家，在纽约成立了阿拉伯海外侨民文学团体——“笔社”，推选纪伯伦为社长、努埃曼为顾问。“笔社”的宗旨是使阿拉伯文学从僵滞、保守、因袭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加强文学与生活的联系，使文学成为民族生活中的一个有效因素。在努埃曼为“笔社”起草的成立宣言中说：“文学家应从生活的土壤中吸取养料，应当具有远大的目光、缜密的思想、细腻的感情。……优秀的遗产是我们灵感的源泉之一，但纯粹模仿只能令文学窒息。为了维护和发展我们的文学，必须面对今天的要求，因为今天的要求和昨天的要求是不同的。”海外作家和阿拉伯本土作家遥相呼应，向旧文学发起猛烈进攻。他们对封建礼教、封建迷信、暴虐不公、贫穷落后等各种社会弊端予以无情谴责和揭露。阿拉伯文学的一股清风，从“山姆大叔”国度吹起。海外作家们具有崭新内容和崭新形式的作品，不仅在广大侨民中引起巨大反响，还通过《艺术》《旅行者》等报刊传到阿拉伯本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45年纪伯伦去世，翌年努埃曼返回黎巴嫩，“笔社”宣告解体。在它活动的年月，影响所及，南、北美洲先后建立了一些侨民文学团体。努埃曼的海外文学活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这个时期他的主要作品还有中篇小说《天花病患者日记》（1944），写一个聪慧过人、内心矛盾的青年，为摆脱浮华生活，在杀死自己美丽的妻子后失去记忆，容貌变丑，后来虽然恢复了记忆，仍然摆脱不了现实生活的折磨。此外还有短篇小说集《往事依依》（写于1944-1945年，后来在黎巴嫩结集出版），文艺评论集《筛》（1944）。返回黎巴嫩后，又写了中篇小说《相会》，短篇小说集《豪绅》《粗腿肚》，诗集《眼睑的悄语》，传记《纪伯伦评传》、回忆录《七十自述》，箴言集《路边的葡萄》，等等。

努埃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文学评论家们公认，即使他一生只写过《筛》，或《纪伯伦评传》，或《七十自述》，也足以使他在现代阿拉伯文学史上不朽，因为这些不同题材的作品，全是现代阿拉伯文学的滥觞。然而最能反映他的文学主张和实践的，是他的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虽然为数不多，只13篇，但以其使人耳目一新的艺术风格、优美纯朴的语言、崇高的思想感情，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和暴露，为我们展现了一幅20世纪上半叶黎巴嫩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

二

像多数东方国家一样，20世纪初的黎巴嫩生活在封建社会之中。传统的封建礼教

和道德还牢牢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在婚姻、家庭关系上表现尤为突出，造成了无数个人和家庭的悲剧，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努埃曼最早的两篇小说《又一年》和《不育者》，首先触及到这一问题不是偶然的。《又一年》刻画了一个形似开明、实则极为保守的村长——艾布·纳绥福。他接连养了七个女儿，如今老伴又快临盆了，他为了盼生个男孩几近疯狂，但结果还是个女婴，他夺过婴孩，把她活埋在教堂后面的松树林里。小说尖锐地提出了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因为艾布·纳绥福必须有个男孩，村长的大印才不会落到旁人手里。小说开头，着重写艾布·纳绥福能写会算，西装革履，甚至胸前挂着金表，比他当村长的父亲“进化”多了，但外表的、物质的进化对他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丝毫没有触动。更可笑的是他把女婴活埋后，还买通产婆四处宣扬，说村长得了个男孩，可惜是死婴。

《不育者》则描写了不育给女性造成的悲剧。加米娜和阿齐兹新婚生活十分美满，但婚后数年不育，加米娜竟遭丈夫和公婆百般虐待。她好不容易挨过十个年头，终于怀孕了，又恢复了天堂般的生活，然而她却自杀了，因为怀孕是通奸的结果。希望怀孕而重新获得丈夫爱情和家庭地位的欲望驱使她犯了罪。小说尖锐地揭示了造成这一悲剧的家庭和社会原因。值得指出的是，加米娜的丈夫阿齐兹起初是深深地爱着她的，但这一爱情是以她生儿育女为前提的，当这一目的不能实现时，爱情便宣告破裂。尽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个聪明勤奋、有事业心，人人夸赞的有教养的好青年，但其思想实质，和艾布·纳绥福并无不同。不育的是丈夫，但社会偏见却把一切祸因归到女性身上。正是这些，导致了加米娜的自杀。小说以其悲剧的力量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

《又一年》《不育者》分别发表于1959年、1959年。当时，在阿拉伯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传统诗歌，小说尚未取得应有的地位，被视为消遣和娱乐，埃及大作家阿巴斯·阿卡德甚至说过：“宁要一行诗，不要一千个故事。”由于努埃曼的成就，评论家们一致公认他是阿拉伯小说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小说在艺术上超过了与他约略同时的穆罕默德·台木尔、纪伯伦等的作品。《不育者》是至今仍拥有读者的有数的阿拉伯早期小说之一。

努埃曼的另一篇小说《打石子儿的人》提出了封建礼教中另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问题，即贞操问题。小说情节很简单：一个靠打石子为生的人，发现十岁的女儿与邻居一行为不检的青年有亲昵举动，便一锤结束了女儿的性命，然后自首，在狱中蹲了十八年。这位父亲十分喜爱自己的女儿，是他在妻子死后一手将女儿抚养成人的。女儿长大后，他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生怕她发生不轨行为。打死女儿后，他二十年没说过一句话，人们只从他有时两眼发直、嘴唇颤抖、大喊大叫中，仿佛看到他内心深处良心和名誉在进行着多么剧烈而痛苦的斗争。最后他终于投海自尽了。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女孩子的不慎或过失而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这在当时，甚至今天的阿拉

伯社会都不是个别的现象。

海外移民是黎巴嫩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而突出的现象。由于种种原因，从19世纪中叶起黎巴嫩和叙利亚就开始向海外移民。当时一部分人迁徙到埃及、法国、澳大利亚，更多的人则涌向美洲，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达到高潮。阿拉伯移民遍及南北美洲，仅在北美就有100万，为此1890年至1900年黎巴嫩本土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移民们抱着发财致富的希望涌向海外，但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的梦想，除少数人成为阔佬外，多数人踉跄街头，充当资本主义的廉价劳动力。描写海外侨民的遭遇是努埃曼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以《杜鹃钟》和《学士文凭》比较出色。《杜鹃钟》的女主人公祖木露黛因羡慕侨商的一只杜鹃钟，不惜在新婚之夜抛弃丈夫哈塔尔，与侨商私奔海外，后来被遗弃，沦为饭店女侍。哈塔尔认为他的不幸是卑贱的农民生活败于发达的西方物质文明，从此他为家乡的一切感到丢脸，终于也离开祖国，漂流海外，二十年后变成了富翁。《学士文凭》中的主人公沙辛得了学士文凭，只想干大事业，但在祖国无法满足，便来到美国碰运气，但结果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欲返故乡而不能。这三个人物均具有典型性，但哈塔尔的经历更富启示意义。他成了百万富翁之后购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杜鹃钟。这时他有了一切，但却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精神。他和他新娶的妻子——西方物质文明的宠儿——也是同床异梦的。他终于醒悟，在一个金钱万能的国度，离开金钱是无法生存的，金钱换不来思想安宁和精神自由，召回不回父母双亲和原来的爱人祖木露黛。最后他回到了离别已久的故乡。初期，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黎巴嫩人移居海外不失为一条万不得已的出路，但后来却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给社会和家庭造成巨大损失。作者正是以其敏锐的观察，洞悉了隐藏在这重大社会现象背后的不幸，勾画出了形形色色近乎“异化”了的人。

努埃曼的另一篇小说《阿勒芬斯先生》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纯金钱关系。一对离开祖国到巴西的年轻夫妇，几年后致富。主人公的小舅子被认为是一位“品德超群”的富翁。一次，主人公和小舅子乘坐轿车途经山岩时，汽车“突然”发生故障，主人公连人带车翻下山沟，小舅子却安然无恙。后来，主人公的财产转到姐姐手里，姐姐又不得不把它交弟弟管理。小说虽然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氛，但它却是现实的。

努埃曼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思恋、对土地的热爱、对劳动的赞美和对贫苦人民的同情。这与努埃曼本人丰富而曲折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涉足过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土地，到过一次大战中的法国，在“金元帝国”生活了二十年。所到之处，无不是被蹂躏的土地，遭受苦难的人民。流落异乡的侨民，处境尤为悲惨。他曾这样叙述他创作《杜鹃钟》的动机：他接到弟弟从家乡的来信，说他想徙居墨西哥。弟弟为追求“幸福”，不惜抛弃家乡土地和妻室儿女，引起了他的忧虑，于是他写了这篇小说，寄给弟弟，打消了他徙居的念头。故事中设计了这样一个场面：哈塔尔在据有了

象征物质财富的杜鹃钟后，仿佛觉得钟楼顶上的那只大鸟只要出来咕咕一叫，人们便立即匍匐在地，跪拜如仪！不，人们不应在异国做“物”的奴隶，应当回到自己生长的土地上去。祖国虽然不是天堂，但“幸福的人身居家园，知足常乐；不幸的人总是到别处寻找安乐”，离开了土地就没有生活。“只有钟爱土地的人，才能得到祖国的同情”。祖木露黛离开祖国，并没有获得她追求的幸福。《学士文凭》中的沙辛爹，卖掉土地和羊群送儿子到美国，结果得到了什么呢？幸福生活靠劳动创造，意外致富是靠不住的。在这一点上，也 《驴尾巴》能给人以启迪：一次，农民巴尔卡特的驴子的尾巴偶然扇掉卖彩票小孩手中的一张彩票。他将这张彩票买下，不意竟中了头彩，获得五万里拉。他老婆一下成为阔妇人，比资本家太太还要贪婪。她凌辱乡巴佬丈夫，逼他把驴子和土地卖掉，尽情挥霍享受。但好景不长，钱财流尽，最后她与象征“荣誉、文明和权势”的汽车一起摔得粉碎。作品具有一定的神奇色彩，显而易见是受到了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影响。《粗腿肚》描写了一个绰号“粗腿肚”的老搬运工，因生活所迫不愿退休，终因体力不支被大汽油桶压死。《钻石婚节》描写一个为报社工作半个世纪的一贫如洗的老工人。在庆祝钻石婚节时被报社当新闻，作弄而死。《为蜜而死的小女孩》描写一个贫苦人家的小女孩，为给出麻疹的弟弟寻找蜂蜜，被蜂螫得全身发肿死去。作者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倾注了对劳动人民和贫苦者的深挚同情。《豪绅》则通过地主下乡收租和农民对他的接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

在 19 世纪初的黎巴嫩，宗教迷信盛行，努埃曼也无情地揭露、谴责了这一现实。《宝物》是这方面一篇难得的佳作。作品主人公沙辛自称是个现代化的人，不信先知圣徒、天堂地狱，却信奉一块护身木，那是他从一个商人手中辗转买来的“钉耶稣的十字架上的一块木头”。为了证明它能避灾祛邪、刀枪不入，他几乎使心爱的儿子成为枪弹的牺牲品。在现实的教育下，沙辛最后把木块扔进了水塘。小说对沙辛羞于见老朋友的内心活动的描写，颇能引起读者会心的微笑。

《贝克阁下》也是一篇颇有深意的作品。狄阿瓦克原是村长，后来家道中衰，处境拮据，但仍处处放不下贵族的架子。更使他恼怒的是，他原先的一个佃户从美洲变成阔佬回村，盖起豪华住宅，并买到了超过他的头衔——“贝克”。狄阿瓦克气得发疯，竟失踪了好几天。当他重新露面时，自称省长已授给了他“贝克”称号，从此人们又看见他在村中昂首挺胸，目空一切。谎言揭穿后，他灰溜溜地逃往海外，在街上擦皮鞋、卖报纸，但在侨民圈内依然装模作样，摆“贝克”的架子。小说实际上是以一个遗老的嘴脸反映了黎巴嫩资产阶级兴起后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

对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暴虐不公现象的不满，有时也使努埃曼发出愤怒的心声。在《老实人沙迪格》中，描写沙迪格因不会说谎，处处碰壁，最后被诬告开车压死人，被判十年徒刑，他不得不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这个世界没有老实人的活路，让这

个世界见鬼去吧！”在《两个造反者》中，描写一个穷苦大学生因母亲病重，起初不得不铤而走险，抢劫别人的财物。后来他和女友摒弃这有失尊严的行为，决心走上自觉与黑暗现实抗争的道路。主人公自白道：“我将为反抗世间一切暴虐和不公而死，将作为一个造反者死去。世间的欢乐也有我们一份，我们决不把它让给那些饕餮成性的人。”这大约是努埃曼在作品中所发出的最强音了。

努埃曼的作品与艾敏·雷哈尼、纪伯伦（早期小说）等人不同。后者或以表现反帝爱国斗争为主，或以抨击封建制度见长，言辞激烈，锋芒毕露。努埃曼的作品则以题材多样化作为特色，风格则似潺潺流水，缓急有序、蕴藉深沉。有些人据此对他有所非议，甚至持否定态度，未免失之偏颇。然而，努埃曼的小说不是完美无瑕的，如有的抽象议论和说教过多、主观色彩较浓，有的题材典型性不够，有的故事情节过于简单等。作者自幼受基督教精神熏陶，受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思想的影响，后来又信奉苏菲主义（神秘主义）和转生说；返回黎巴嫩后由于种种原因与社会接触较少，这些都影响了他对某些题材的深入开掘（特别后期小说），或使某些作品带上了神秘色彩。如《过路人》等就表现了他的苏菲主义思想，认为上帝无所不在，只要人心向善便能和上帝相通，得到上帝的恩惠。一个瘫痪卧床七年的女孩子，一旦父母对流浪汉（上帝的化身）萌发怜悯之心，便霍然痊愈，所谓“你父母无病之日就是你病愈之时”。作者企图以这种说教来促进人们精神和行为的净化，实在是不可取。

三

从总体看，努埃曼无疑是一位现实主义创作占上风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之所以为人喜爱，首先是因为它取材于社会生活，反映了与人民息息相关的现象和问题，爱人民所爱、恶人民所恶。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和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他小说的一个主要特点和生命力所在。在他之前的阿拉伯文学中，出现过从西方翻译或改写的小说，也出现过按古典《玛卡梅韵文故事》编写的小说和借古喻今的历史小说，与阿拉伯现实社会缺乏紧密联系，地方色彩很弱。努埃曼与纪伯伦等人组织和领导的侨民文学团体“笔社”，其宗旨之一是加强文学与生活的联系。他认为文学的力量在于真诚而朴实地表达普通人的心理和感情。他自己实践了这一主张。他的作品多数取材于现实生活，特别是他熟悉的山区、乡村生活和海外侨民生活。

他的小说被人喜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成熟的写作技巧和语言的魅力。他了解优秀的阿拉伯文化遗产，熟悉俄国、法国、英美文学。他开始创作时，已具备较成熟的文学修养。他的小说一般都不长，然而对小说创作中各种手法的运用，却胜过不少同时代作家。

细致的心理刻画，是努埃曼小说的一大特色。《又一年》中写到艾布·纳绥福在妻

子临盆时的心理活动时，说当他想到老伴要生男孩时，他甘愿把半份家产捐给教堂，并且每日晨昏两次亲吻老伴的脚跟；当他想到要再生个女孩时，便全身发颤两眼发黑。把女婴活埋后，还到处宣扬是男婴。《不育者》随着加米娜处境的每一步变化，对她的心理活动都有细腻的描述，如她怎样思考丈夫冷漠的原因，怎样憧憬做母亲的幸福，等等。她临死前留下的遗书则更是她全部心理的自白。《豪绅》中，赖希德爹妈在怎么接待前来收租的地主上，左思右虑。《礼物》中，穷搬运工麦斯欧德为给新婚妻子买礼物，思绪绵绵。正是这种细致的心理描写，使努埃曼在早期的阿拉伯小说中居于领先的地位。

在努埃曼的作品中，烘托、对比、反衬的手法运用十分成功。艾布·纳绥福一出场，俨然是一名随时代而进化的佼佼者，不仅穿着入时，而且为人排忧解难，深得村民拥戴。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亲手将女婴掐死埋了。《不育者》意在谈不育给女性造成的悲剧，却又不拘泥于此。它不仅揭示了不育的实际原因，增强了暴露的效果，而且还通过加米娜怀孕前后丈夫、公婆对她态度的反复变化，加深了对社会风习的批判。《宝物》中的沙辛反复声称自己是个现代化的人，不是糊涂蛋，甚至公开宣布基督的“全部奇迹都是违背健全理智的”，但是这样一个“见多识广，经历丰富”的人，却深信一块木头的灵验，险些亲手枪杀了心爱的儿子。这种强烈的烘托、正反的对比、有趣的反衬，是努埃曼常用的手法，它们往往造成情节的悬念，或者反打正着，收到加倍的艺术效果。

努埃曼十分注重典型塑造和细节描写，这与他坚持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宗旨是分不开的。他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对当时黎巴嫩社会的重要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作者是从日常的、普通的生活里，选取那些富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加以集中、提炼、概括，使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最大限度融合，从而创造出具有典型性的故事和人物，使“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别林斯基语）。加米娜、尔、“粗腿肚”……既是小说中的“这一个”，又是社会上众多受封建礼教迫害、流落异乡被压在社会底层的“那一个”。故事和人物的典型化往往是通过具有典型性细节的描写来完成的，如遗老狄阿瓦克拒收不署“贝克”头衔的信函；加米娜本想在母亲那儿得到安慰，却不得不反过来安慰因女儿不育而伤心的母亲；心灵受到巨创的打石子儿的人从不回答人们的问候；地主为满足自己小女儿的心愿，临走时顺手带走赖希德爹妈小儿子视为珍宝的小羊羔和大公鸡；等等。有趣的是，不少作品中都有一件事或物在起着贯穿整个内容和点化主题的作用，如《杜鹃钟》中的杜鹃钟，《打石子儿的人》中的锤子，《宝物》中的护身木，《贝克阁下》中的“贝克”称号、《为蜜而死的小女孩》中的蜂蜜、《粗腿肚》中的一只大汽油桶等等。

努埃曼的小说能深深吸引读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语言的魅力。他从小爱读阿拉伯古典诗歌和散文，打下了扎实的语言根底。但他认为，古阿拉伯语言不

是完美无缺的，应当发展。他重视吸取大众的生活语言，同时借鉴西方和俄国文学的写作风格。因此他作品的语言既优雅流畅，又朴实自然，无雕饰造作之感。《豪绅》中赖希德爹妈合计接待地主一家及后来的场景，写得淋漓酣畅，浑厚有致，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极富性格化的对话，跃然纸上。他作品中的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之所以生动而富有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语言的运用。清新简约的风格，是阿拉伯侨民文学的重要特点，它对此前注重声韵、流于冗长的阿拉伯散文文学是一重大突破和变革，尤以纪伯伦和努埃曼成就为最。

也许，努埃曼小说的那些特色（语言除外），与他之前的西方小说或以后的阿拉伯小说相比，已经不显得那么突出，但在当时，却是振聋发聩的。我们对他的小说（主要是早期小说），是放在 19 世纪初阿拉伯文学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给予评价的。

努埃曼本人说过：“文学的核心是人。作品有无生命力，取决于它深入生活、探寻生活目标、揭示生活障碍的程度。”（《七十自述》）他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为阿拉伯文学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财富。他的名字，将像塔哈·侯赛因、陶菲格·哈基姆、台木尔、纪伯伦一样，在阿拉伯文学史上闪烁不朽的光辉。

（1938 年）